

“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 论战的部分简述

(一九七九年四月一日)

一九七一年一月九日《人民日报》第二版登载了一篇长文，题为《哲学战线上的一场严重斗争》，署名是“中央党校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文章一开头就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是杨献珍挑起来的。这样说，证明了“写作组”的人对于这场争论的历史情况是有意加以歪曲的。我是这场斗争的参与者，也是这场斗争的历史见证人，有责任把这场斗争的真实情况，如实地记载下来。尤其是因为参与这场斗争的对立面的主要人物已经不在人世了，我更应当严格地遵守着唯物主义原则，在叙述时力求真实，这是幸存者起码应有的道德。

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

问题争论的主题是什么

北京解放后，马列学院（中央党校的前身）从平山县的山沟搬到北京来。《光明日报》哲学副刊有一个时期登载了一些批判不可知论的文章，我都看了一下。有一篇文章的作者对于马列主义哲学史的知识一点也没有，他拿黑格尔批判不可知论所用的理论，即思

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来阐述世界可知论，并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下面，加个括号，注明“这是唯物论”五个字。我看了，心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论，怎么说是唯物论？当时我也只是看了一下，心中翻腾了一下，也就过去了，没有发表任何议论，写什么批评文章。总之，是抱了自由主义的态度。但马列学院的教学计划中，关于哲学的学习，订有《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本书，这本书的第二章讲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时，就要涉及到这个问题。那时我心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究竟是唯心论还是唯物论，在学习时要给学员交代清楚，不能含糊。那时主讲哲学的是艾思奇同志，我没有教学任务，但我是教育长，学员学的好坏，理论的、认识的正确与否，我也负有一份责任，不能漠不关心。在学习《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第二章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时，就发生了争论。艾思奇同志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恩格斯的原话，是唯物主义。我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明明是黑格尔的话，怎么说是恩格斯的话？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明明是唯心主义，怎么说是唯物主义呢？——请记住，这场争论是这样开始的，争论的主题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究竟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就这样争论了几天，艾思奇同志看到他的论点站不住脚了，承认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黑格尔的话，不是恩格斯的话，承认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不是唯物主义。可是他又用“但是”二字作一转语，说什么，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虽然是唯心主义的命题，但也可以作唯物主义的解释。请记住，他的这个论点以后就变成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他的主要观点，一直贯串到他逝世之前的两篇文章——两论《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我一直不同意他的这个观点。我说，对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

性这个哲学史上传统的唯心主义命题,认为既是唯心主义,又是唯物主义,一身而二任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到底有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上边的那句话(我打了着重点的)艾思奇同志虽然是那样说,但实际上后来他径直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主义。

一九五七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翻译的《列宁全集》第十四卷(即《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出版了,其中的第六章中说:“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同一性理论,是十足的胡言乱语,绝对反动的理论”,“是露骨的唯心主义”云云。这样一来,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主义的人们都慌了手脚,因为列宁的话他们是不敢反驳的。从此,在这场争论的过程中产生了好几个插曲,今已成为轶闻轶事,但因为是历史事实,不能使之永远湮没无闻,所以也要在这里记下一笔。

我的一本《什么是唯物主义?》的讲稿中,在讲到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时,打了一个比方,说小学国语读本上有个故事:有一条狗口里衔了一块肉,在一座桥上走着,它忽然看见桥下水中也有一条狗衔着一块肉,桥上的狗丢下它口里的肉去抢食桥下水中那条狗口中的肉。我说,这条狗就是一个唯心主义哲学家(更确切些说,应当说这条狗就是一个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哲学家)。这个比方错了没有呢?至今我还认为没有错。不意这个小小故事却惹下祸了。某理论领导机关当时出了一种内部刊物,有一期上把我说的这个比方抄登在上面。我就感到这是一个不祥之兆。随后又一期上忽然登出列宁的话,说列宁说,思维和存在的等同性是露骨的唯心主义,是十足的胡言乱语,绝对反动的理论。这样一来,“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变成唯物主义,主张“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主义的哲学家,从此得救了,他们更加理直气壮地宣扬思维和存在

的同一性是唯物主义。到了一九六〇年,《列宁全集》第十四卷(即《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出单行本,这个单行本译文唯一的改动就是把第十四卷中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一律改为思维和存在的等同性(只有几处漏掉未改,还露着马脚),这是本书的一个重大改变,按理出版者应当对这个改变加以说明,告诉读者为什么要作此改变的理由。可是事实却并非如此,改变是不声不响地悄悄地改变的,书前书后没有半个字的说明。看来,这是一个骗局,欺负中国人懂得洋文的人太少。他们用了狙公朝三暮四,暮四朝三的要猴子的办法来玩弄不懂洋文的中国人。同一个外国字: identity 译作等同性,就是唯心主义,译作同一性,就是唯物主义。The identity of thinking and being 译作思维和存在的等同性,就是唯心主义,译作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是唯物主义。中央党校革命大批判写作组在一九七一年一月九日的《人民日报》第二版上发表的那篇“万言谤文”中说,“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批判的是思维和存在的等同性,不是批判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不就是等于说,列宁在这本书中批判的是 The identity of thinking and being 而不是批判的 The identity of thinking and being 吗? 请看这不就是在耍猴子吗? 有人说,等同性也好,同一性也好,只是一个“名词翻译”的问题,值不得去计较。说这样的话的人,正是上了当还不觉悟,把毒药当糖吃的人。也正是因为这一改,那种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主义的人们,就相继地抛出了好几篇“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文章。这是在向恩格斯身上泼污水,侮辱恩格斯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企图以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去证明任何思维产物的现实性,这正是一个叫做黑格尔的人所说的最荒唐的热

昏的胡话之一。”试问恩格斯怎么会把他亲自批判过的这种“最荒唐的热昏的胡话”又肯定起来呢？难道恩格斯也是这样颠三倒四，毫无原则，不懂逻辑的人么？艾思奇同志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主义的理论，他的这个观点全部贯彻在他生前最后的两篇著名的文章中，即两论《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文章中。追随他的人，还用他的这种观点去注释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与《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真是谬种流传，流毒全国，遗害无穷。一九六四年康生指示高级党校主要负责人还公开向全校学员和全体教学工作人员宣布：艾思奇同志的“两论”是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争论的最后结论，从今以后不许再提这个问题了，所有的党报党刊一律不许刊登有关这个题目的争论文章了。文化专制主义在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四年就已经开始了。真正主持这件事的人是那个专搞政治阴谋，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窍不通的反革命阴谋家康生，因为他是管高级党校的真正的“主人”，党校主要负责人不过只是小心谨慎地被迫执行他的旨意而已。

但这个“结论”是不能使人心服的。当时许多学员和有点主见的教学工作人员都只是组织服从，心中气愤。一九六七年夏，我被从哲学研究所揪回高级党校，关在高级党校私设的监狱中，叫做“隔离审查”。在被审查的余暇，我写了两万多字材料，说明艾思奇同志的“两论”是反马列主义的，是侮辱恩格斯的，不配作为这场理论斗争的结论，请求党校战斗指挥部报告毛主席和党中央，明令有关单位对这场严肃的原则性的理论斗争重新作出正确结论。这份材料我交给了当时的党校战斗指挥部，并请求他们分别抄送康生和陈伯达各一份。材料交给战斗指挥部以后，再也未听到下文，

后事如何，不得而知。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三日的夜晚，我已睡下了，忽然来人叫我起来，向我宣布我“被监护”了，于是把我装上汽车送进一座正式监狱。一九七一年一月九日，《人民日报》第二版上发表了中央党校革命大批判写作组写的一篇题作《哲学战线上的一场严重斗争》的文章，这篇文章除无耻诽谤，下流谩骂外，没有任何内容，我把它叫做“万言谤文”。一九七三年夏，我有一个机会得到纸笔墨水，我又写了将近二万字的抗议书*，驳斥谤文中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一些胡言乱语。这份抗议书交给了中央专案组。交去之后，专案组又是以沉默对付我，没有对我说过一个字。

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争论的要害就在于把唯心主义硬说成是唯物主义，理论颠倒，是非混淆。二十多年了，理论上颠倒了的是非至今还没有颠倒过来。比如有些哲学家说哲学根本问题第二个方面是唯物主义反映论，而那些人们却硬说，在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可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乃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于此可见在哲学根本问题上的思想混乱到了何种程度。而这个禁区至今还没有任何人敢去触动。这种哲学根本问题上的思想混乱，对林彪、“四人帮”搅乱马列主义哲学思想是起了很大启发或前驱作用的。

上面说到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争论的过程中有几个插曲，那个理论恶霸在哲学战线上的瞎指挥是这种插曲之一。还有所谓“杨献珍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云云，也完全是康生捏造出来诬蔑陷害我的。

那个根本不懂理论的“理论恶霸”，几十年来在中国把理论

* 见本书《一九七三年在狱中写给专案组的抗议书》一文。

思想搅得异常混乱。他还自视为是哲学论坛上的一个“元帅”。一九五八年《哲学研究》第一期的第一篇，就是郭月争同志写的题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的文章。当时在人民大学哲学系学习的学员于世诚同志看到这篇文章，认为是错误的，就写了一篇题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主义的原理吗？》的批判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的哲学副刊上。那个“理论恶霸”荒谬地说：谁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论，就是不承认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就是认为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是一种反动思想，云云。这种荒唐的谬论已经在社会上尤其在哲学界大为流行。世诚同志的文章一开头就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是唯心主义哲学的原理，它与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反映论是根本对立的。”人民大学哲学系的同学们认为世诚同志的这样立论，与“理论恶霸”的胡言乱语不相符合，于是就对世诚同志开展批判。一天，胡锡奎同志到我处，我顺便同他谈起来，说你们哲学系学员于世诚同志的文章基本观点是正确的，你们哲学系的学员对他批判是不对的。我同时把一九五七年出版的《列宁全集》第十四卷（即《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第六章第二节指给他看，那里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露骨的唯心主义，是十足的胡言乱语，绝对反动的理论。胡锡奎同志回校后，立即叫哲学系停止了对于世诚同志的批判。于世诚同志的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后，《哲学研究》一九五九年的第11—12期转载了。安徽省的学术界看到北京的报刊登载了批评郭月争同志的文章，认为郭月争同志在理论上犯了错误，于是也准备对郭月争同志展开批判。“理论恶霸”听说此事之后，立即给安徽省的领导打长途电话，说郭月争的文章是正确的，不许对他进行批评〔注〕。从此北京哲学

界的某些头面人物在“理论恶霸”的指挥棒的指挥之下，发表了许多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唯心主义的理论，把这一理论“创造性地”变成唯物主义的理论，甚至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一时间把哲学界闹得乌烟瘴气，把哲学思想弄得极度混乱，遗害至今还在流传。这就是这个“理论恶霸”在哲学论坛树立的“辉煌业绩”。

这个“理论恶霸”对我的造谣诬蔑，我很长时期没有注意到。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人民大学的造反派把胡锡奎同志从西北局揪回来批斗，人大的外调人员到我处调查，说胡锡奎说我告诉他，列宁说过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我听了大吃一惊。我说，列宁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怎么会把列宁没有说过的话告诉他呢？我说，我只是告诉过他，列宁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露骨的唯心主义，是十足的胡言乱语，绝对反动的理论，如此而已。

说我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这是那个“理论恶霸”打我的一根棍子，至今还有人把这根棍子接过去用来打我，这如何能令人容忍呢？

〔注〕 一九六〇年秋，康生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说，是他打长途电话给安徽省委的领导，叫他们不要批评郭月争同志的。

致《哲学研究》编辑部的三封信

(一)

《哲学研究》编辑部：

贵刊一九七八年1—2期合刊上登有吴江的《哲学上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文。在本期第45页，他说杨献珍讲哲学根本问题时，“当涉及到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的时候，多数话就不能听了，不仅不能听，还要批判。比如他讲，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又在同页上说我提出“综合基础论”认为五种经济成份是“平行发展”的，等等。请贵刊编辑部代问吴江：他在什么地方看到我讲过“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和“平行发展”？请吴江举出确实证据，尽快在报刊上公开答复。并请把我的这封信也在贵刊发表。

此致

敬礼！

杨献珍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二)

《哲学研究》编辑部：

贵刊一九七八年第1—2期合刊登有吴江的《哲学上两条战线

的斗争》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说我有一本讲稿，其中有专门一节讲“主观能动作用问题”。吴江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把人的意识的反映作用和能动作用割裂开来，说人的意识‘于反映作用之外还包含了能动作用’，好象反映作用和能动作用是两回事，好象没有能动作用也能够反映事物。这是错误的。”（着重点是吴江加的）首先要声明一下，我在这里是讲的认识论问题，不是讲的生理学问题。吴江若是不把问题扯到生理学问题上，而是放在认识论问题的范围内，吴江说：“反映本身也有能动作用，是能动的反映”，那末按照这种说法，费尔巴哈的反映论也是能动的反映论了。不仅费尔巴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也都是能动的反映论了。这样一来，哲学史就需要重写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说：“……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马克思在该文的第十一条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在这里好象也是说那时的哲学家们也还没有认识到反映都是能动的。按照吴江的哲学观点，马克思在这里岂不是无的放矢，说了废话吗？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提到了一个资产阶级哲学家莱维，说他在自己写的有关费尔巴哈的著作的第二部第三章里专门研究了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莱维说：“马克思认为遗憾的是：唯物主义曾经让唯心主义去评价能动力〔即人的实践〕的作用。”“马克思认为：应该把这些能动力从唯心主义手中夺过来，也把它导入唯物主义的体系中，但是，当然必须把唯心主义所不能承认的那种实在的和感性的特质给予这些能动力。”按照吴江的哲学观点，列宁在这里引用

一个资产阶级哲学家的话，岂不是“多此一举”吗？

列宁在其《哲学笔记》中还说过，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似乎列宁这样说也是把反映作用与能动作用看作两回事，把二者“割裂”开来了。按照吴江的说法，列宁这样说，当然也是错误的了。

普列哈诺夫听说一九〇三年以前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曾说过这样的话：“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指出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缺点。马克思还说，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所以会有这种缺点，是因为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换句话说，费尔巴哈说我们的‘我’只是因为受客体的影响才认识了客体。马克思反驳道：我们的‘我’因为对客体的影响才认识了客体。”（着重点是原有的）普列哈诺夫在这里也是说反映作用，不全是能动的，也还有被动的。在实际工作中也有这种情形。极简单的例证，就是那些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者，对他们工作的周围环境的具体情况、干部情况等，不主动地去作认真的调查研究，只是坐在办公室里，靠看文件，听汇报，甚至于看假报告，听取谎报去办事。这种官僚主义者，你能说他一点情况不了解吗？那也未免太冤枉了。但是象这样的情况，也能说是“能动的反映”吗？很明显，在认识论的发展史上，说反映作用与能动作用是一回事，是站不住脚的。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马克思第一次创立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常识。

吴江说：“杨献珍始终没有弄清楚这个问题，他没有真正读懂《实践论》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也就是说，吴江是精通了这些哲学文献的。吴江说的反映作用和能动作用是一回事，反映

本身也有能动作用，在认识论中似乎同马克思、列宁、普列哈诺夫说的有点不大一样。这个问题涉及哲学根本问题的一个方面。贵刊是全国哲学刊物的权威刊物，发表了象吴江这样的伟言高论，对全国的哲学工作者影响很大。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究竟应当相信马克思、列宁、普列哈诺夫说的正确？还是应当相信吴江说的正确？希望贵刊，并请吴江予以澄清。

再者，吴江说我没有读懂《实践论》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还说“我”讲授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许多地方严重歪曲了列宁阐明的认识论原理。”（附带声明一下：我没有“讲授”过《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我只是同原高级党校的学员们一起学习时，“领读”过这本书。）吴江的这些话说得都有点太笼统，对受批判者没有教益。我的水平很低，没有读懂这两本书，我愿恭恭敬敬地执弟子礼，拜吴江为明师，请吴江有以教我，将不胜感激。至于说我歪曲了列宁阐释的认识论原理，希望吴江说得具体一点。明确指出究竟我是在列宁的哪本书中，哪些章节和怎样歪曲了的。

吴江指出我讲唯心主义者都是不可知论者，是违反哲学史的常识的。我那时没有提明黑格尔是彻底地批判过康德的不可知论的。承吴江指出我的这个疏忽，特在此声明向吴江表示感谢。

希望贵刊发表吴江的答复时，也把我的这封信作为附件一并发表。我希望全国的哲学工作者对我的错误严格地予以指正，使我能有改正错误的机会，我将衷心地感谢同志们的教诲。

此致

敬礼！

杨献珍

一九七九年一月九日

(三)

《哲学研究》编辑部：

贵刊一九七八年第1—2期合刊本第46页上载有吴江的这样一段话：“否认真理是一个过程，要求在认识上、行动上不发生任何错误。毛主席针对这种倾向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真理不是一次可以认识的，机械唯物论就是一次完成真理。又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世界上没有一次完成真理的天才，认识真理总要经过实践的反复。要求一次完成对真理的认识，这是形而上学的机械论，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请问吴江，是谁否认真理是一个过程，要求在认识上、行动上不发生任何错误？我从来没有否认真理是一个过程，要求在认识上、行动上不发生任何错误。我也没有听说过谁否认真理是一个过程，谁要求在认识上、行动上不发生任何错误，谁要求过一次完成真理的认识。我只听到另一位大哲学家批判过所谓“一次反映论”，其说法和吴江说的都一样，吴江只是把“一次反映论”换成“一次真理论”。批判所谓“一次反映论”的历史背景是这样的：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年代，有那么一个省，样样工作都好的了不得，号称全国第一，又号称“千斤省”，即全省每个县小麦都是亩产超过千斤。有一个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揭开7320之谜》，登在一个哲学刊物《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这位党委书记还被从他所在的那个省请到北京来作“科学”经验介绍报告。一九七五年我被“四人帮”流放在陕西潼关，听那里的人们说，这个党

委书记还到潼关宣传过“7320”，即亩产7,320斤。这个省还放了好多卫星，什么钢铁卫星，小麦卫星，玉米卫星……等等。一个地方，什么设备都没有，竟然一天一夜炼出130万吨钢，登在《人民日报》上。一个生产大队的支部书记以亩产玉米一万斤的“成绩”，来北京参加劳模大会，获得“劳动英雄”的称号。如此等等，几天也说不完，我就不再往下说了。那时，前面提到的那位哲学家在那个省的某个县，住了七、八个月，对这种情况熟视无睹。一九六四年时，有人议论大跃进年代某省的领导有主观主义，那位同志听了，说某省没有主观主义，说他要挺身而出，为某省辩护，说谁要是说某省有主观主义，那就是“一次反映论”，也就是吴江说的“一次真理论”。那时，我也曾到那个省去看过。我们学校（原高级党校）有几十个教学干部，都在基层住了几个月，把下边的真实情况，摸的清清楚楚，他们向我汇报了很多骇人听闻的弄虚作假的事情，我听了不胜惊异。《聊斋·考城隍》有几句话：“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我当时不禁慨叹地续了两句：“有意作假，当如之何？”

这里要请问吴江：弄虚作假，放假卫星，究竟需要几次反复，几次试验，才能认识那是“真理”？弄虚作假，放假卫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真理吗？这难道就是你们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吗？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只许“长官”弄虚作假，不许小民说个“主观主义”。主观主义还不是我说的，要是叫我说，那就是不折不扣的主观唯心主义。

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在进行批判或论战时，首先应该根据事实，而不应该根据凭空捏造的材料或主观的臆断。尤其是在哲学理论上，更应该严肃谨慎从事。应该调查研究，弄清真实情况，实事求是地进行批判或论战。那个所谓的“理论权威”，是惯于搞无中生有，

任意捏造，断章取义，随便篡改等手法，胡乱给人扣帽子，诬蔑陷害坚持唯物主义的革命者的。正因为他们是一帮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实用主义者，是别有用心和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的坏家伙，所以把哲学界搅得乌烟瘴气、混乱不堪。而吴江在“四人帮”倒台后，说要“从各个思想理论领域批判林彪、‘四人帮’，澄清被他们搞乱的许多基本理论问题”，但他写的这篇文章，在有些地方，根据不可靠的材料（如他说我说过“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平行发展”及前一封信和这一封信中所提到的一些问题，就他批判的“综合基础论”和“合二而一”问题，也有许多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对我进行所谓的“批判”，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此致

敬礼！

杨献珍

一九七九年二月八日

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第二个方面 是什么”的通信*

匡亚明同志：

多少年来因时局的变幻，彼此没有来往了。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包括你在内的许多老同志遭受残酷迫害，无情打击。我自己则是更早地(从一九五九年底)就开始受迫害打击。迫害打击我们的都是那个古今中外历史上罕见的权奸康生，即被称为文革顾问的狗东西(他自己会刻图章。他是光绪戊戌年生，自己刻了一个“狗”字图章，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派人到处抄家，把北京几家大藏书家的善本书都抄到他家里去了，他把抄到的每本书都印上那个狗字章，表示为他所有。北京故宫把他抄去的书籍文物搞了一个展览，我去参观过一次)。所幸我们经过这场浩劫，都能活过来了，算是不幸中之大幸。

你知道在中国哲学界有一场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从五十年代争起，经过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还未结束，八十年代是否能够结束，还未可知。这不是一场无谓的争论，而是一场原则性的争论，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论还是唯物论的争论。这场争论也可以说是一件“奇事”，把我们哲学界的许多头面人

* 此信发表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一九八〇年第三期。

物都考试了一下。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没有人争论，这是这场争论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这是那个根本不懂理论的“理论权威”或理论小丑表演的一出丑剧。我只是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而他则说，杨献珍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就是不承认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就是认为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如此云云。所以，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之说，是那个理论骗子强加给我的。

这场争论涉及到哲学根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不少人说，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一九七八年有一期《南京大学学报》的哲学论文就是这样写的。哲学根本问题第二个方面是反映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说思维即存在，存在即思维，思维和存在是同一个东西。那么，谁是反映者，谁是被反映者，究竟谁反映谁呢？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是取消了反映论的。

这场争论暴露出我们的哲学工作者存在的弱点，就是马列主义哲学的基础课没有学好。有些属于哲学常识的问题没有弄清楚，以致往往以讹传讹。大学的哲学课在基础课方面似乎还需要补课。

寄去的一篇稿子，在北京无处发表，是在安徽的一个刊物《江淮论坛》上发表（去年上海《学术月刊》发表了我几篇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寄去的目的是想向一些哲学工作者请教。希望能接到你的回信。

祝你愉快，幸福，健康！

杨献珍

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九日

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

——答孙春山同志

今年三月下旬接山东省济宁地委党校教研室孙春山同志来信称：

在学习《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时，对第二章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同志们理解不一，难成定论。

“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命题，明明是黑格尔的“绝对观念”等同于现实世界的唯心主义论点，但为何对这一命题要从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观点来肯定？

诚然，辩证唯物主义承认思维是存在的反映，而且思维对存在有反作用，并且是实践把二者沟通起来；但这能纳入“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命题之下吗？

……现在是否人们把这个“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把这个唯心主义的命题，硬要作唯物主义的解释呢？

马列原著人们已经学了几十年了，对其理解，应该有个定论。我们的理解不知对否？……

* 本文发表在《江汉论坛》，一九八〇年第四期。

孙春山同志：

你三月下旬寄来的信收到了。你的信中提到的问题，你的意见是正确的。寄去一份我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的文稿（《论恩格斯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关系》），供参考。此稿已在安徽的一个理论刊物《江淮论坛》上发表了。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我有几篇稿子都在去年上海出版的《学术月刊》上发表了，不知道你看到否？关于这个问题，从一九六四年被中央高级党校当时的主要负责人宣布为禁区，不许再讨论，不许任何党报党刊再发表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文章，以维护把这个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命题解释成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命题的那个新主张。至今这个问题在北京有些单位仍然是禁区，有的学校甚至重申禁令，不许再提这个问题，因此，反驳那个新主张的文章在北京就难于发表了。

一 问你，现在是否人们把这个“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把这个唯心主义的命题，硬要作唯物主义的解释呢？正是这样！这是一件奇怪的事。他们把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的第二章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提法都修正了。恩格斯明明是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第一方面，即世界的本原问题，同第二方面，即认识论问题，是有内在联系的。但从六十年代初以来，他们只承认在第一个方面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而在第二个方面却这样地或那样地否认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认识路线的对立，认为只是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对立，而且认为这就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他们进而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唯心主义的而且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命题，解释成唯物辩证法的命题，于是在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他们就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

题”来代替“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或者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命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的共同概括，并说因此恩格斯在批判不可知论时引述了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命题。等等，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此信不能一一评论，只提出黑格是怎样解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问题，就可看出恩格斯是否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命题，并用来作为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第二方面的共同概括，也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概括，用来代替唯物主义反映论。

黑格尔是用同一性(同一个东西)来解释二者的关系的。他认为思维即存在，存在即思维，思维与存在是同一个东西。黑格尔已经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赋予了一定的规定性，即唯心主义的同一关系。他是把物溶化于心中，把存在溶化于思维中，实际是取消了物或存在而建立了思想一元论的唯心主义，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唯心主义。这个哲学也叫同一哲学。而中国有些哲学家，不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解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却要用这个观点去解释已经确定了的唯心主义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硬要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解释成辩证唯物主义。这种哲学头脑显然是很奇异的。

你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命题，明明是黑格尔的“绝对观念”等同于现实世界的唯心主义论点，但为何对这一命题要从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观点来肯定？你问的很对。把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等同于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这在马列主义哲学史上，是一个老修正主义的谬论，而我们有些哲学家却把这种谬论拾来当宝贝，当作他们新发现的真理。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当作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这是把两个敌对的认识论看作是同一的了。这是

“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命题的妙用。

读《费尔巴哈论》第二章第二节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第二方面的论述时，最好同时参读一九五七年版的《列宁全集》第十四卷（即《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第二章第一节（本书的第94—95页）列宁关于这段文章的引文。列宁引用恩格斯的这段文章时，略去了“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这句话。把恩格斯的这段文章的原文和列宁的引文对照着读，细细推敲，就会了解恩格斯的原意。在这里要弄清楚三个问题：（一）恩格斯在这里肯定的是什么问题？（二）恩格斯在这里，为什么插上了“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就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这句话？（三）列宁的引文为什么又把这句话略去了？

把列宁的引文细细地读一遍，就会明白地看出来，恩格斯在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所提出的三个问句，简单地说，就是世界可知不可知的问题。列宁的引文在引了这三个问句后，紧接着就写道：“恩格斯说‘绝大多数的哲学家肯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列宁的引文把问题与回答紧密地摆在一块，使读者很清楚地看出来，恩格斯所说的绝大多数哲学家“肯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不就是指“肯定地回答了”世界可知不可知的问题吗？恩格斯在三个问句之后所以插上“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就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这是因为肯定世界可知性的“绝大多数哲学家”不仅有用反映论来肯定世界可知性的唯物主义者，而且也包括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论”来肯定世界可知性的唯心主义者，例如，黑格尔就是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来肯定世界可知性的，在他看来，世界可知性问题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宗教家说，

上帝创造了世界，因而就能全知万事万物。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也是创世说，他的绝对观念（或绝对精神）只是上帝的别名。既然他的绝对观念创造了世界，成为世界的思想内容，而人的思想也是绝对观念的体现，因此，人的思想能够认识世界中的思想内容，所以认识世界也就是绝对观念的自我认识，而他的哲学就是绝对观念自我认识的最终点，就是绝对真理。

列宁的引文略去了“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这句话，说明了恩格斯在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所提出的问题是世界可知不可知问题，而不是唯心主义哲学“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肯定的是世界可知性，是人的认识能够正确地反映现实世界，而不是肯定唯心主义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列宁的这段引文，使得说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哲学家们非常狼狈，因为在这里他们说的恩格斯肯定的东西却没有了。有讽刺意味的是，所有认为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哲学家，都不敢触及列宁的这段引文，他们从来都没有提到过列宁的这段引文。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第二章第二节（本书的第111页）中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马赫主义者巴札罗夫强加给恩格斯的，是他把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强加给唯物主义的^①。不知为什么现在还有些哲学家仍然坚持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

既然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的第二章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所肯定的是世界可知性，是人的认识能够正确反映现实

^① 巴札罗夫把恩格斯的学说修改成“感性的表象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列宁在本书第341页上说，感性的表象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是露骨的唯心主义，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露骨理论。

世界，而不是肯定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那么，恩格斯在那里为什么插了一句“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引出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呢？这是由于当时哲学斗争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占统治地位的新康德主义和休谟主义的不可知论。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恩格斯肯定了黑格尔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根本命题“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恩格斯总是明确地把唯物主义反映论同唯心主义“思维和存在的同一论”对立起来的。在《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说明了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的唯心主义实质，并指出按照黑格尔的原则来改造全世界，“这是他和几乎所有的哲学家所共有的幻想”。在《反杜林论》中，他也明确指出：“企图以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去证明任何思维产物的现实性，这正是—一个叫做黑格尔的人所说的最荒唐的热昏的胡话之一。”（《反杜林论》，第39—40页）黑格尔承认世界可知性是正确的，恩格斯就肯定他的这一点，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他承认世界可知性的理论根据，而这是唯心主义的，恩格斯怎么会肯定这一点呢？列宁深知此意，所以在引用恩格斯的这段话时，就把这句话略去了。我们有些哲学家却把事情完全搞颠倒了。他们对恩格斯在那里所真正肯定的世界可知性，人的认识能够正确地反映现实世界，一字不提，而对恩格斯所批判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或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却连篇累牍地写文章大肆宣传。从一九五八年《哲学研究》第一期发表了郭月争同志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一文起，就好象给哲学研究领域开辟了一个新生面，于是有些哲学家就竞向这方面奔进。六十年代初，某著名哲学家一再论证“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至今还有些报刊仍然这样大肆宣传。

黑格爾的同一哲學，在中國的大躍進年代，曾經“從理論轉移到實踐中去”，什麼“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產”，什麼“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什麼“思想有糧就有糧，思想有鋼就有鋼”，如此等等，不就是“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思想的體現么？那位哲學家還把這種思想提到哲學基本問題的理论高度。他曾宣傳，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要特別注重“精神變物質，思維變存在”這兩個飛躍的伟大意義。他說：“沒有社會主義的政治思想，就沒有社會主義的存在，反過來也可以說，廣大工農群眾在思想上有了社會主義，就會在客觀上、物質上得到社會主義①。所以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工作中，我們在什麼時候都必須明明白白地堅持思想第一的原則。”這位哲學家把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論或思想第一原則在實際工作實際生活中運用到純熟的程度了，夠得上成為黑格爾的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哲學升堂入室的信徒了。

馬克思在《神聖家族》中說：“思想從來也不能超出舊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況下它都只能超出舊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思想根本不能實現什麼東西。為了實現思想，就要有使用實踐力量的人。”（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2頁）

自今以前我還只知道有些人把哲學基本問題的第二个方面攪亂了，以為還沒有人去攪亂哲學基本問題的第一个方面，這是由於自己見聞狹窄，與世隔絕十幾年，耳目閉塞，一些奇聞奇事也聽不

① 馬克思在《神聖家族》一書中說，黑格爾的門徒鮑威爾之流，教導工人們說：“只要他們在思想中消除了僱傭勞動的想法，只要他們在思想上不再認為自己是僱傭工人，並且按照這種過於豐富的想象，不再設想自己是作為單個的人來支取工錢的，那麼他們就會真的不再是僱傭工人了。從這以後，作為絕對的唯心主義者，作為以太的生物，他們自然就可以靠純思維的以太來生活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6頁，着重點引者所加）請把這一段話同這裏的引文比較一下。

到、看不见。最近发现十几年前这位哲学家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一个方面就已提出新见解了。关于“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问题，在一九六五年，这位哲学家就说过：“所谓物质第一，就是说物质是根本的东西。‘第一’这两个字翻译的不够确切。‘物质第一性’应该翻译成‘物质是根本的东西’，或者‘物质是根本性的’，精神才是第二性的。翻译成根本性比较好。……有些人就反对我们讲思想第一，用教条主义方法来反对我们讲思想第一，硬说讲思想第一是违背唯物论。杨献珍就是这样提的。他不敢公开写文章这样说，但在内部^①这样说。”（这段妙论是从一本铅印书上引来的。）在哲学基本问题第一个方面，存在第一性、思维第二性，或物质第一性、思想（意识）第二性这个唯物主义根本原理，被修正为“思想第一”，“精神是第二性的”了，谁要是坚持存在是第一性思维是第二性的原理，谁就是用教条主义方法来反对他们讲思想第一了。“思想第一”，“精神第二”这个公式是明明白白地把“存在第一性”修正为“思想第一”，“物质是根本性的”就成了饰词，事实上是把存在、物质溶化在思维、精神之中了。至此，把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修正成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了。大功终于告成了，不仅在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用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代替了唯物主义反映论，而且在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也用“思想第一”代替了“存在第一性”，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也就变成地道的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哲

^① 这里用了“内部”二字，是很恶毒的。我除了共产党的组织外，没有加入过其他任何组织。一九六〇年王从吾同志到高级党校任校长时，那个阴谋家“理论权威”（按：指康生）曾无端地散布过流言蜚语，说什么高级党校有所谓“王（从吾）杨（献珍）侯（维煜）反党集团”，这种造谣诽谤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传说了好多年。这里所说的“内部”大概就是指这个“反党集团”说的吧？

学了。

在我国大跃进年代和文化大革命十年大动乱大破坏的年代，我们不是把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哲学，“从理论转移到实践中去”了吗？用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哲学来进行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过是拥护“同一哲学”的“所有哲学家的共同幻想”而已。这样做的结果，是经济濒于破产的边沿，几乎导致了亡党亡国，人民遭受深重的苦难。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黑格尔的最荒唐的热昏的胡话，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哲学去改造社会，是哲学家的幻想。列宁在本世纪初也指出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在实际生活中的体现，就是把幻想当现实。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露骨的唯心主义，是十足的胡言乱语，绝对反动的理论（详见《列宁全集》第14卷，第342—343页）。我不理解，为什么我们有些哲学家，有些理论刊物，对于这样一种理论还是如此迷恋，如此恋恋不舍，同一哲学的“老调子永远唱不完”。难道他们还嫌十年动乱乱的不够吗？还企图用这种哲学来指导我们实现四化吗？这是南其辕而北其辙。我看同一哲学的这种老调子可以休矣！不要再作孽了！

马克思曾说过，他若不是把最好的东西送给工人阶级，就是对工人阶级犯罪。我们有些哲学家和理论刊物，把列宁所说的那种“十足的胡言乱语，绝对反动的理论”，任意地向全党全国喋喋不休地进行宣传，这又当作怎样的评价呢？

十九世纪初期，费尔巴哈曾说过这样的话：“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中成长和生活的人，其精神状态是怎样的呢？这种人的精神状态就是分不清思想（或表象）和对象物。”也就是说，分不清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我国哲学界二十多年来在关于思维和存在的

同一性问题的争论上，岂不是在实践中证明了我们有些哲学家的精神状态恰恰就是这样的吗？然而他们仍然自夸他们的哲学观点是正确的，是辩证唯物主义的。

敬礼！

杨献珍

一九八〇年四月三十日